

日據時期台灣小說所反映的現代性接受樣態

崔末順*

<目次>

- 一、前言
- 二、新文化運動與對現代性的省思
- 三、殖民資本主義的進展與對現代性的批判
 - (一) 現代化的真相和虛相
 - (二) 人的物化和人性的疏離
 - (三) 知識分子的無奈與否定現代
 - (四) 傳統家庭制度和價值的沒落
- 四、皇民化的內在矛盾與回歸傳統
- 五、結語

一、前言

台灣的現代文學已有八十年以上的歷史，這期間受到帝國主義擴散的影響，曾經有過淪為日本殖民地，以及戰後在冷戰體制下追求現代化，並高度經濟成長的經驗，而今天也正面對著以資本主義全球性發展為前提的全球化浪潮。由此看來，台灣文學的過去和現在，一直都跟世界性資本主義的發展有著密切的關聯，而這些問題，我們通常都是以現代性課題來加以把握。

文學的現代性問題，可說是存在於透過與西方接觸而進入現代的大部分東亞國家，因此，進行觀察各國文學如何接受並如何因應現代性，將能夠提供我們一個了解東亞國家面對同樣歷史情境，所開展的現代文學旅程的角度。在東亞國家中，台灣的

* 台灣 國立中正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助理教授

例子比較特殊，她是在淪為日本殖民地之後，才開始接觸西方進入現代，因此不可避免地，必須面對挾帶殖民主義和日本性而來的現代性課題，而且在她接受和適應的過程中，也呈現出相當複雜多重的面貌。

本文將分為新文化運動時期、殖民資本主義的發展和皇民化時期等三個階段，進行考察日據時期(1895-1945)台灣小說中所反映的現代性接受樣態，來作為研究台灣現代文學發展過程，以及了解東亞國家現代性的一個基礎。

二、新文化運動與對現代性的省思

在二〇年代，處於日本殖民狀態之下的台灣，透過與世界的接觸，開始接受以啟蒙和進步為原理，以理性和科學精神為核心內容的現代思想。隨著日本在台灣所實施的現代化進展，人民也逐漸體驗到資本主義帶來的現代經驗。初期知識分子接受現代性的過程，是從對普遍現代性的自覺和啟蒙，發展到對民族處境的覺醒。被稱為新文化運動的這個時期，文學也被要求扮演重要角色，那就是擔負著文化啟發和社會改良的任務。從主張文字改革、中國文學革命的介紹、對舊文學弊病之改革，到現實主義文學理論的建立，該時期新文學運動的具體內容，不外乎積極接受西方進步的現代思想，來建立合乎現代的台灣新文學。

不過，這些以啟蒙精神為基礎的初期現代性，由於係日本單方面的主導、引進並實施現代制度，因而在小說中呈現多樣複雜的面貌。一般來說，台灣的現代小說，經過了二〇年代初期的實驗¹⁾，到了二〇年代中期的重要作家賴和，才宣告完成。賴和的小說與前期不同，不僅呈現許多客觀現象的面貌，同時還探究在現象背後所隱含的本質，因此，到了賴和，台灣新文學基本上已達到全面性觀察現實的境地。其中，最明顯的就是在日本的統治下所造成的現實問題。日本標榜“現代化”為統治台灣的政策

1) 一般認為台灣現代小說的出現始於1920年代初期，而此時期的小說內容主要為批判封建制度、追求民族覺醒和文化啟蒙、青年的現代適應問題等。

依據，也實施了貨幣制度、統一度量衡、交通建設等現代制度。²⁾然而，這些制度的落實，係在殖民和被殖民的結構中進行，因此，對被殖民的台灣人民而言，現代化只不過是日本人在台灣利益操盤的手段，它意味的卻也只是台日間不平等法源依據的建立。雖然，文明進步和現代化是初期知識分子所期望的方向，但由於現代化過程係透過殖民政策引入，這也就招來他們的負面感受，並使他們對現代性的契機產生疑慮。

這其中，最先吸引作家目光的，是與一般民衆日常生活息息相關的法律問題，這也是知識分子對日帝所主張的現代法治國家實際內容產生懷疑的切入點。首先，賴和是最早提出任意適用法律，以及法律不平等問題的作家。敘述日本警察榨取小販的《一桿稱仔》³⁾中，描述主角得參受辱、挨打、被關進派出所，以及繳納罰金的理由，都是因為日本巡查隨便認定稱仔有問題的緣故；在《豐作》⁴⁾中的添福，也因為製糖會社任意的操作測量器，而得不到應得的勞動代價；《惹事》⁵⁾中的寡婦被日本警察誤認偷雞竄枉被抓，而為此抗議不公的“我”，結果卻也被警察隨意按個妨害執行公務、侮辱官吏、搗動、毀損名譽等的罪名而受到威脅。日本警察可以如此恣意的、不公平的適用法律，可說全是因為背後有殖民制度撐腰的關係。

因為巡警們，專在搜索小民的細故，來做他們的成績，犯罪的事件，發見得多，他們的高昇就快。所以無中生有的事故，含冤莫訴的人們，向來是不勝枚舉。什麼通行取締、道路規則、飲食物規則、行旅法規、度量衡規紀，舉凡日常生活中的一舉一動，通在法的干涉、取締範圍中。⁶⁾

可見殖民政府織起能適用所有日常生活的法網，動員警察監視大眾日常生活的每一個環節。制定這種法律的是殖民政府，而在現場執行的又是他們的代理人警察，可看出賴和企圖要批判的核心是什麼。那些警察並不依照法律執行公務，而是爲了個

2) 日本爲確實執行對台灣的長期殖民統治，從1895年開始，花費了將近15年的時間，針對台灣的人口、土地、民俗風情展開全面調查工作，同時建立了度量衡和貨幣制度，並完成了治安維持、交通建設，以及逐出外國勢力等的基礎事業。參考矢內原忠雄，周文獻譯，日本帝國主義下之台灣，頁13-37。

3) 原載於《台灣民報》九十二、九十三號(1926.2.4, 2.21)。

4) 原載於《台灣新民報》三九六號、三九七號(1932.1.1, 9)。

5) 原載於《南音》一卷二號、六號、九、十合刊號(1932.1, 4, 7)。

6) 《一桿稱仔》，《台灣作家全集—賴和集》(前衛，台北，1991)，頁59。

人的利益或面子，任意的適用法律和規則問題。在《一桿秤仔》中被認為象徵現代化和現代制度的稱仔，被警察任意的“打斷攔槓”，就意味著日本所主導的現代化面臨破產及自我毀滅，而且“從根本上侮辱了啓蒙思想者對於客觀的公平合理的樂觀信仰，更從根本上否定了理論上應該建立在自由平等博愛正義等代表資本主義精神的法的尊嚴”。⁷⁾ 得參認為秤子是“官廳的專利品”，而他因這個“專利品”受害的內容，則意味著控訴主導現代化的殖民統治政府未能有效地運用文明的利器，反而以其作為壓榨弱小台灣民衆的工具；就這個原因而言，現代化制度可說是被認知為不合理的。

如此，賴和特別以法律制度面的不合理，指出造成台灣人痛苦的原因，就是要讓我們知道他所進行的批判重點，在於反省日本主導的現代化問題。遭到殖民政府代理人警察打斷、故意操作錯誤的秤子與稱量器，赤裸裸的暴露出日本以現代法治國家之名，卻實施差別待遇的政治策略這種名不符實的虛偽面貌。法律存在的意義在於保障人民權益、安定社會秩序、促進社會進步，是現代精神的象徵，也是現代社會的機制，而它同時是殖民政策的執行根據，更是台灣現代化的標識。賴和的小說揭露出象徵現代文明的法律，只服務於當權者的權益，已失去公平與正義，且淪落至不合理、不人道的地步，徹底摧毀法的尊嚴，引發了有關現代性的反省和質疑。

制度與法律等統治機制被認為是台灣現代化的具體成果，然而在台推動制度與法律時，卻嚴重地扭曲了現代性。賴和能即時對從屬資本主義化所帶來的現代性提出深刻的批判，與賴和本身是位積極參與文協新文化運動的啓蒙主義者絕對有關。他相信理性與進步，甚至憧憬科學精神所主導的現代社會，他所希望的世界，乃是人性受到尊重，並且受到合理與公平待遇的世界。⁸⁾ 然而，眼見台灣的現實體制逐漸扮演起鞏固異民族支配的角色，且資本主義現代化亦朝著宗主國利益優先的方向進行，賴和不得不重新思考這個經過日本引入的現代文明本質，因而陷入了進退兩難的局面。如果接受現代文明和理念，在一定程度上，就必須認定日本帝國主義的支配，而這就是啓蒙主義者賴和的苦惱。在制度和法律方面提出殖民統治不當性的賴和，在現代性問題上，主張接受合理理性的現代理念，但反對或拒絕扭曲現代精神的殖民支配邏輯。

7) 施淑，〈秤子與稱錘——論賴和小說的思想性〉，收錄於《兩岸文學論集》(新地，台北，1997)，頁280。

8) 林瑞明，台灣文學與時代精神(允晨，台北，1993)，頁144-77。

《蛇先生》這部小說正代表著賴和對現代性問題深刻反省的寫照。它的主要架構，建立在象徵現代科學的醫學根據，並與傳統秘方加以對照。蛇先生本是以抓田雞維生，由於蛇吃田雞，他比一般人更了解捕蛇的技巧及蛇傷的治療。有一天經他治療的人居然好了起來，消息傳開後，衛生單位判定蛇先生未得法律許可，任意進行醫療行為，因此將他逮捕，關在留置間。不過，蛇先生的拘押與釋放，反而大大提高了他的名聲，來找他看病的患者越來越多。表面上，作者對人們相信秘方採取否定的態度，但更重要的是，作者肯定蛇先生的想法和作法。

蛇不是逐尾有毒，雖然卻是逐尾都會咬人，我所遇到的一百人中真被毒蛇所傷也不過十分之一外，試問你！醫治一百個病人，設使被他死去十幾人，總無人敢嫌你戒慢，所以我的秘方便真有靈驗了。⁹⁾

從蛇先生答覆求取秘方的西醫的這一段話中，可以得知賴和所重視的是追求理性、實事求是的精神，足見他擁護的是現代價值和現代文明的核心精神。他既反對一般人迷信秘方，又批判玩弄法律的支配階層，但主張合乎事實的合理查察和求證。

透過賴和的這幾篇小說，我們知道啟蒙時期台灣作家所嚮往的是合理的現代精神能成為思考和行動準則的世界。賴和所處的現代社會，雖然部分打破了舊社會的舊觀念，並帶來文明這個新的準則，但是在缺乏自主性改革的殖民地台灣，這個文明準則卻遭到帝國主義價值觀的擺布，成為收奪和壓迫的對象。象徵合理的秤子和稱量器，受到支配階層和資本家的恣意毀損；保障萬人平等的法律，成了支配階級的兵法。賴和透過小說對只在名義上存在的現代性，表示強烈的質疑、否定和虛無感，並在殖民體制中尋找現代性的矛盾，可見他的觀點已接近當代現代性問題的核心。

三、殖民資本主義的進展與對現代性的批判

隨著日本的殖民體制日趨完善，對台灣的經濟榨取也日益加深，主導文化啟蒙的

9) 《蛇先生》，《台灣作家全集—賴和集》，頁89-90。

知識分子，在因應殖民資本主義以及追求民族獨立的過程中，因而分化為左右兩派，各自追求不同的路線。在這樣的時代氛圍中，從二〇年代後期開始，台灣文壇也出現強調階級矛盾的社會主義左翼文學傾向，開始揭露在台灣進展的資本主義弊害，以及由此加深的貧富差距、人的物化和疏離現象，呈現出批判或否定現代性的傾向。

(一) 現代化的真相和虛相

現代化的進展在都市的形成與發展上最為顯著。在日據時期小說中的台北，高樓大廈櫛比鱗次，輝煌的街燈照亮街頭，花花綠綠的男女擠滿咖啡店和公園，頗具現代大都市的風貌。

茉莉花般排著的兩旁的路燈，輝煌地照得亞士華爾卓發黑油油的光亮。咖啡店的紅綠藍的“良·薩茵”在涼冰的夜氣中露出寂寥的微笑顫抖著。¹⁰⁾

這新興的向近代化塗上鶯進著的台灣人街市大稻埕。幾年之間，觸眼盡是高樓林立，電光閃爍，照得像白晝一樣。¹¹⁾

無論在大都市或郊外，都逐漸在改頭換面，進行著所謂的現代化與都市化的建設。不過，小說中的都市人並未因此而過得活潑快樂，反而大都被描繪成患有嚴重憂鬱症，或者處在彷徨飢餓的邊緣線上。就上面所引用的王詩琅小說中人物為例，他們或是勞動者、或是失去熱情的社會運動家、或是一般的上班族，雖然走在現代大都市台北的街頭，卻絲毫沒有享受到都市化帶來的方便，反而面對現代都市種種的壯觀景象，失去了感覺。他們走在這個已現代化的水泥叢林之中，感到絕望和無奈。這大概要歸責於殖民政府主導的現代化建設，與殖民地人民的利益背道而馳。無關都市大小，這種現象全島都有。殖民地台灣的民衆不但看不到文明帶來的希望，或現代化的

10) 王詩琅，《沒落》，《台灣作家全集—王詩琅、朱點人合集》，頁57。

11) 王詩琅，《十字路》，《台灣作家全集—王詩琅、朱點人合集》，頁84。

甜蜜果實，反而屢屢從現代化建設中，嚐到苦果與絕望。

蔡秋桐在《新興的悲哀》¹²⁾中描述都市建設對一個台灣農民家庭，造成了嚴重損失，以及心靈上重創的景象。T鄉的發展和農民林大老的沒落是同步進行的。T鄉大部分的土地，地權屬於拓植會社，由當地的農民租來耕作。後來拓植會社的社長從日本人改為台灣人，主張將原本屬於拓植會社的土地還給該地人民，開始宣布買賣，因而吸引了鄰近村民的目光。但是拓植會社的真正目的在於炒作地價，他們透過日本警察C大人出手幫助而達到目的。C大人利用權力對保正們施壓，迫使他們把土地讓出來形成市街，造成T鄉迅速發展的假象，然後開始對外宣傳，當然參與的警察能得到相當豐厚的利益。在這裡作者揭發村落所謂的“發展”，不過是由台灣資本家勾結殖民支配階層，所做出來的假象而已。在報刊雜誌上看到連日不斷報導新都市開發消息的林大老，決定舉家搬遷到T鄉。但在這個時候，卻碰上世界性經濟恐慌；爲了因應不景氣，日本實施產業合理化經濟緊縮政策，影響所及，T鄉的發展也不太順利。加上C大人並未積極改善投資環境，反而助長非法的“嫖賭飲”事業；他以發給執照、營業牌的名義，從非法營業者手裡收取暴利。結果C大人和組合監視所日漸發達，反觀，像林大老這樣相信政府開發計劃的農民，卻面臨走投無路的困境。“T鄉本是大老的樂土，現在卻變成大老的怨府了。”可見所謂現代都市的建設，只不過是由腐敗的日本官吏和本土資本家，以及拓植會社的聯手操作，所演出的一場鬧劇。蔡秋桐透過這篇小說，控訴以開發與建設爲目的而施行製糖會社、拓植會社等殖民政府的台灣現代化政策，最後帶來的卻是犧牲農民等弱小階層的利益；相反的，權力階層與資本家卻不斷的進行壓榨與剝削。這個真相，引出作者對台灣現代化的質疑，並促使讀者重新思考有關現代性的本質。

蔡秋桐的另一篇小說《奪錦標》，敘述的是來自日本的A大人帶領村民美化環境、建立衛生環境，之後該村得到一等賞的故事。A大人所主導的環境衛生和美化作業，首先在其動員百姓的手段和方法上，暴露出許多問題。A大人一上任，便叫保正和甲長強制動員百姓整理環境，但是村民還有蕃薯的收穫、插田、斫甘蔗等農事待做。如果百姓不聽從，A大人便辱罵、糟踐村民，甚至處以罰金，沒錢的村民只好被

12) 原載於《台灣新民報》三八七、三八九號(1931.10.24-11.7)。

迫參加勞動。然而逼迫農民整理環境，並不是爲了村民的健康，而是另有其他目的。

因爲這個麻拉利亞防遏作，累得放屎百姓足足做了一個多月“無錢工”，什麼蕃薯、甘蔗、稻田……雖然荒了許多，但，牛庄卻居然成功了一個文化村落了。這意外的好成績，不要說外來的貴賓要加以滿足的讚歎，就是A大人也會驚異自己威力的偉大，滿意極了，現在就只有等待上司光臨檢點而已。¹³⁾

A大人之所以動員百姓，名義上雖是爲了牛庄的環境美化與清潔衛生，實際上卻是爲了自己個人的升遷仕途。因爲對百姓來講，得一等賞與否，已經不是他們所關心的事。從農民的“勞民傷財，足足去二三萬圓，還驚中不著一等賞？”，“幹恁娘，這統抬舉A大人升官，保正伯仔喫燒酒……”等說法中，可以知道他們對這件事的看法。由於農民的犧牲，成就了第一等文化村落的美名，結果A大人獲得升遷，而留下的只是荒廢已久的農事，以及農民貧困的生活而已。小說從接受一等賞的表彰式開始，以倒敘的手法描寫A大人赴任之後進行環境美化作業的經過，逐漸揭露日本官吏的貪心和劣根性，以及日帝推行公共事業的實際情況，在這個過程之中慢慢浮現日本支配台灣的正當性問題，以及突顯日帝在農村推動的現代化質疑。

朱點人的小說《秋信》¹⁴⁾，用不同故事來對日本在台灣的現代化建設所代表的意義，提出質疑和反省。小說的背景爲1935年，台灣總督府爲了慶祝據台四十週年，在台北舉辦盛大的博覽會。“當博覽會未開幕以前，當局者都竭力宣傳，而島內的新聞亦附和著鼓吹，就是農村各地，也都派遣鐵道部員前去勸誘，本來不怎麼有益的博覽會，一經宣傳的魔力，竟然奏了效果，引起熱狂似的人氣。”因此，斗文先生也受到到處要求參觀博覽會的影響，決定到台北去一探究竟。斗文先生是一位外表看似過著隱居生活，其實是一位具有民族精神，以及熱衷於社會改革的人物。“當社會運動方爛的時候，他雖然沒有挺身去參加實際行動，但社會運動一分望的文化運動的貢獻，卻是不少。”上台北的途中，首先他在火車上聽到，百姓因警察的強制要求，而被迫參觀博覽會的內情。在博覽會場裡看見“產業台灣的躍進，是始自我們的口號，

13) 《奪錦標》，《台灣作家全集—楊雲萍、張我軍、蔡秋桐合集》，頁191。

14) 原載於《台灣新文學》二卷三號(1936.3)。

以及聽到日本學生對他投以鄙夷的眼光，他覺得受了侮辱，感到說不出的悲哀。

“倭寇！東洋鬼子！”他始終不管得他們聽得懂與不懂，不禁的衝口而出了：“國運的興衰雖說有定數，清朝雖然滅亡了，但中國的民族未必……說什麼博覽會，只不過是誇示你們的……罷了……什麼”產業台灣的躍進……，“這也不過是你們東洋鬼子才能躍進，若是台灣人的子弟，恐怕連寸進到不能呢，還說什麼教育來！”¹⁵⁾

可見在秀才的眼裡，殖民政府策劃博覽會的目的，不過是日本在開拓殖民地之後，對台灣人民的自我宣傳。他進一步質疑日本殖民政策究竟帶給台灣人民什麼。小說透過充滿民族精神、重視傳統文化的舊知識分子，以及他的寂寞和失落，對於殖民地台灣的現代化，充分表現出負面的評價，並督促讀者思考日本在台進行的現代化的真相，以及其對台灣人民的得失。¹⁶⁾

在城市裡進行現代化的同時，農村也經歷了以農村資本主義體制—半封建地主制的實施與新機器的登場為代表的現代化經驗。就如“甘蔗糖業的歷史，就是殖民地的歷史”¹⁷⁾一般，日據時期台灣農村改變最大的就是製糖業的發展。從1910年開始，以日本人大企業為主的獨占資本大量進入農村，大肆收購台灣農民的土地；按照統計，到了二〇年代，八分之一的台灣土地，已經落入日本資本家所經營的新式製糖公司之手。¹⁸⁾由此，原本擁有農地的自耕農，一夕之間失去了土地，為求糊口，有些農民變成製糖工廠的勞工，有些則成為佃農。由於田地變少，佃農變多，因此佃農之間，自然會為耕作起衝突，而這些狀況又促使地主開出更加蠻橫嚴苛的條件。另外，日本實施的殖民資本主義，也間接地默許地主對農民的苛刻榨取，因此造成農民貧窮的真正原因，可說就在於日本殖民政府的支持。

15) 朱點人，《秋信》，《台灣作家全集—王詩琅、朱點人合集》，頁235。

16) 陳芳明認為《秋信》正是一篇拒絕殖民者歷史敘述的重要作品，它吐露台灣社會在現代化過程中付出的代價是無法估算的。參見〈三〇年代台灣作家對現代性的追求與抗拒〉（第三屆通俗文學與雅正文學全國學術研討會，2001）。

17) 同註2。

18) 觀察這個時期台灣的農村現況，即可發現小農的急速零細化（細農化）、佃農耕作地面積的擴大，以及佃農數量的增加等現象。依據1921年的統計，台灣的佃農耕作地面積，佔全部稻田耕地面積的69%、旱田的48%，平均達58%，與同時期的日本和朝鮮相比，高出許多。涂照彥著，李明峻譯，《日本帝國主義下的台灣》，頁121-125。

楊守愚可說是最關心此一問題的作家。在《凶年不免於死亡》¹⁹⁾中，主角至貧原是佃地耕種的佃農，這一年因為發生稻熱病，全村的稻子多半遭到熱死，沒了收穫的他，雖然苦苦哀求地主減租，結果地主反而收回他耕作的田地，甚至還變本加厲地把他所有的家當全都押走。而雪上加霜的是，官公所為了徵收戶稅，使出毆打、威脅等各種手段，甚至叫他賣掉兒子以繳納稅金。賣掉兒子之後，太太哀痛欲絕，傷心而死，好好的一家人瞬時變得家破人亡。

《升租》、《醉》等楊守愚的其他小說，敘述地主單方面通報要提高佃租，並收取“贖地金”(押金)，但佃農卻毫無抗拒的立場與餘力，只能自哀自憐地表示忿怒與不平，以及農民為了維持生存，演出競相削價來爭取租田的故事。農民的這些悲慘狀況，雖可直接歸因於地主的非人道和橫暴行徑，然而由於地主背後有殖民統治階級的支持，無寧說這是因殖民統治這個社會結構性的因素所引起。地主言行橫暴，回收土地又能自如，仗恃的是他在佃租契約上佔了上風之故，而形成這種不合理的地主與佃農關係，就必須歸責於殖民政府所實施的殖民資本主義制度。楊守愚的這兩部作品，能夠確實地掌握住當代農村的核心理論所在，深刻的刻畫出生產與分配不均的農村現況，並把此一狀況形成的矛盾，明確地指向殖民政府所實施的半封建地主制。

由此可知，日據時期的台灣農村社會已脫離了封建地主與佃農(所有權與耕作權)的關係，土地的使用權已成為一元化(只有所有權得到認定)，因而產生了生產者(農民)和生產手段(土地)分離的現象，這種情況被稱為半封建地主制。而在這個制度的背後，則存在著以經濟榨取為目的的殖民統治。日帝為了增加稻米產量，並有效的奪取米穀的產收利益，乃在台持續維持不公平的地主制度—地主對佃農行使口頭契約、縮短契約期間、過度徵收佃租等獨占權利，可說是掌握了佃農的生殺大權。²⁰⁾

農民被納入半封建地主制度，在農村資本主義化過程中呻吟的情況，一直存續在整個三〇年代。楊逵的《水牛》、《模範村》和呂赫若的《暴風雨的故事》²¹⁾等小說，共同呈現出地主的橫暴已達到極點的狀況；張慶堂的《鮮血》、徐青光的《謀生

19) 原載於《台灣民報》二五七號、二五九號(1929.4.21、28、5.5)。

20) 日據時期的佃農爭議內容，在農民組合的宣言文、檄文、演說文或決意案當中，處處可見。有關農民運動，可參考警察沿革誌編纂委員會，《台灣社會運動史IV—農民運動》(創造，台北，1989)。

21) 原載於《台灣新文學》創刊號(1936)；《台灣文學叢刊》第三輯(1948)；《台灣文藝》二卷五號(1935.5)。

»描述的是佃農因鐵租而面臨破產的故事；林越峯的《好年光》²²⁾ 則反諷辛苦耕種的佃農，好不容易盼到豐收，對未來生活充滿著期待，卻由於米價的暴跌，落得只能吃馬鈴薯苟活度日的悲慘下場。這些內容都反映了1935年前後，日帝為擺脫經濟恐慌危機，穩定國內物價，而從殖民地廉價買進米穀，使得稻米生產者—台灣農民加速沒落的現實狀況。

呂赫若的《牛車》²³⁾，探討的另一個農村問題，也就是文明利器對農民和農村零工的影響，提供我們了解當時人民如何看待現代化的一個線索。主角楊添丁是位搬運車夫，用代代相傳的牛車討生活。自從自行車和貨物車出現之後，他的工作機會急速減少，甚至到了連維持生計都很困難的地步。他的生存工具牛車，已被現代的交通工具取代，再也沒有人要找他搬東西了。一向託付楊添丁搬運的碾米廠老闆，現在也改用運貨汽車，即使汽車不能走的地方，也用腳踏貨車搬運。現在連山裡的人都改用腳踏貨車，速度慢的牛車已經被時代的潮流沖走。而遇到這種遭遇的也不只是牛車……

不只是牛車。從清朝時代就有的東西，在這種日本天年，一切都是無用的。原本我家的稻穀，就是委託那個放尿溪的水車。可是，當這種碾米機出來後，那個慢到無話可說。反正都要付出相同的工資，那就決定靠這個囉。不只是我，大家都這麼認為。如今，那個水車已經不見踪影了吧？總之，日本東西很可怕。²⁴⁾

在這裡，日本天年(日本主宰的天下)和清朝，分別代表著現代和前現代階段，而在重視經濟效益的現代，傳統的東西被迫淘汰。牛車、水車、轎子等利用人力和畜力的工具，在面對貨物車、碾米機、汽車等利用科技的現代機器時，只不過是一堆破銅爛鐵而已。然而對依靠傳統方式生活的農民而言，日本人所帶來的便利且又有效率的文明利器，只是一群剝奪他們生計的魔鬼。因此，農民對造成他們沒落的機器，懷著無比的恨意。代表現代化的文明機器，變成破壞他們原有生活的敵人，而這個敵人又是來自日本。在這裡我們可以發現，作者將現代機器做為批判日本殖民統治，以及審視台灣現代化的有利媒介。

22) 原載於《台灣文藝》二卷九號(1935.9)；二卷三號(1935.3)；二卷七號(1935.7)。

23) 原載於《台灣文藝》二卷五號(1935.5)。

24) 《牛車》，《呂赫若小說全集》(聯合文學，台北，1995)，頁35。

另外，馬木歷的《西北雨》²⁵⁾，主要探討殖民政府爲了稻米的穩定生產，在農村建設的水利事業和灌溉設施，到底帶給農民什麼樣的利益和方便的問題。一群等待西北雨的農民，眼看著“田已是眼巴巴的開了裂縫，禾穗立刻可以變成草仔埔的”情況，個個都在歎息。雖然大圳的水多到氾濫，他們卻只能求老天爺下一場西北雨，以解救枯萎的稻苗。因爲水利機關規定“三年輪作”的鐵則，只能三年用一次大圳的水，結果今年碰到嚴重的旱災，他們即使繳納規定的水租，還是無法引用大圳的水來灌溉農田。以前雖沒有大圳，也沒鬧過這麼嚴重的旱災，但是到了灌溉設施完善的現在，反而讓農民苦等西北雨的光顧。可見農民對水利事業，持著相當懷疑的態度。不止是水利設施，凡是日本殖民政府所推動的關於交通、產業、衛生、生活改善等措施，沒有一項是真正爲農民著想。像這樣，作者藉著農民的不滿、抗議及歎息，來控訴殖民政府在農村所建設的水利設施，不但沒有幫助農民，反而變成加害他們的工具。小說藉著針對水利設施只爲殖民政府的利益服務提出批判，引出對農村現代化質疑和反省的聲音。

(二) 人的物化和人性的疏離

隨著現代化朝著壓榨台灣民衆的方向發展，台灣民衆的生活自然沒有獲得多少改善，反而在都市中，由底層勞工和從農村分離出來的農民所構成的都市遊民階層隱然成形；而在農村，佃農的貧窮化也日益加深，全體台灣社會普遍蔓延著嚴重的疏離意識。黑格爾用“外化”來解釋人的疏離現象，認爲主體被客體所支配的狀況；馬克思則透過被疏離的勞動和貨幣物神性，來探討疏離的現在性狀況；佛羅姆認爲疏離就是人將自己看做一個異質存在的經驗及認知。²⁶⁾以此觀點，審視日據時期小說所顯現的疏離問題，可以發現貧困導致價值觀喪失或倒置、市場指向性人物的量產、知識人的無奈和逃避等現象產生。而這些都是殖民資本主義現代化所帶來的負面現象。

25) 原載於《台灣新文學》一卷十號(1936.12)。

26) 參考鄭文吉，《疎離論研究》(文學與知性社，漢城，1991)，頁180-213。

張慶堂的小說《年關》²⁷⁾描寫人力車車夫阿成不堪挨餓受凍，持槍威脅富人，而被警察逮捕的故事，旨在對貧富差距這個資本主義制度的矛盾提出批判。阿成不斷地想像用從富豪那奪取的錢，讓一家人一起過年的幸福景象。小說從描寫他那無法成真的幸福的想像當中，生動地反映出他所處現實的窘迫程度，讓讀者對他們不得不揚棄道德良心及社會規範，從事反社會的行為，感到無奈與同情。

因貧窮而引發的顛倒價值觀現象，在呂赫若的《牛車》中亦會出現。楊添丁的牛車同行老林就視做賊為理所當然之事；他因為好賭，而成為豬窠(拘留所)的常客。跟楊添丁為了找生意而每天奔波相比，老林認為傻子才會做工，遊玩過日反而是上策。林老認為賭博和做賊都沒什麼不對，這是找不到工作的日本天年的必然現象。這些人的道德墮落，並不全是人性的問題，主要還是由於殖民資本主義矛盾引起的貧富差距所造成。他們雖然為了擺脫窮困，付出了很多努力，但是社會環境迫使他们走上險路，讓他們拋棄了道德良心和法律規範，做出反社會的行為。這些被疏離人們的扭曲人性和顛倒價值觀，是來自殖民地社會的不合理結構。警察、地主、富人及小市民、佃農、無產大眾所形成的支配與被支配的殖民社會結構，以及獨占資本和以榨取為主要發展的殖民資本主義，加上碰到不景氣和長期失業，一般民衆的生活越發困苦，人性和價值觀也就日益墮落、荒廢。

一吼的小說《乳母》²⁸⁾所要表現的是，母乳的原本價值遭到扭曲，成了交換價值的商品。素雲顧不了自己幾個年幼小孩的饑餓，為了代替失業的丈夫賺錢，去做有錢人家的乳母，而自己的小孩因得不到母親照顧，生病死去。這篇小說將貧窮引發的貨幣物神化，以及都市貧民的疏離現象，透過母乳變成交換價值的商品，生動地表現出來。

台灣人的貧窮，以及由此引起的貨幣物神化的現象，與以苛捐雜稅為主調的殖民地經濟政策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他們的極度貧困，除了帶來人生價值和生活倫理顛倒的現象，更在步入現代化之後，於社會全面蔓延開來。將金錢當成價值判斷的準則，可以說完全顛覆了從前的生活價值，人們不再注重精神生活，取而代之的則是對

27) 原載於《台灣新文學》一卷四期(1936.5)。

28) 原載於《台灣新文學》一卷三號(1936.4)。

物質生活的追求。在這種風氣的瀰漫之下，貧窮，正是破壞正常生活，喪失道德良知的根本原因。因此，這些小說呈現出在缺乏基本生活條件的狀態之下，道德的墮落，以及慾望未能得到滿足所帶來的貨幣物神化現象，可說是作者努力掌握當代生活條件狀況的表現。

在現代資本主義社會裡，造成疏離現象的媒介之中，貨幣的角色最為突出，影響也最為深遠。豪塞爾認為貨幣是物化的工具，也是將所有價值還原於一個共通分母的手段，而在價值一元化的社會就會產生疏離；²⁹⁾ 馬克思則認為貨幣是能支配慾望和力量的世俗之神，惟有放棄貨幣，才能回復人性，也才能克服疏離。³⁰⁾ 崇拜多金的人間群像，在朱點人的小說中有著深刻的描繪。《紀念樹》敘述的是一個經自由戀愛而結婚的女子，在知道丈夫唯利是圖的真面目之後後悔不已的故事。在學校教書的梅兒，到醫院確認自己罹患肺結核的時候，不經意的得知先生真正想要的只是金錢而不是愛情。醫生說她的肺結核已是第二期，需要絕對的休養，但她的先生無視醫生的勸告，反而叫她繼續上班賺錢，這樣才能支付醫藥費。梅兒的先生和婆婆對金錢的執著，可說是佛羅姆所指的資本主義社會市場指向性的代表例子。³¹⁾ 梅兒的先生是看上她的收入而跟她結婚，他的母親亦是如此。他們與其他人維持表面的關係，甚至將他人視為商品，都是些表裡不一，行為和想法互相衝突的偽君子。在《長壽會》和《安息之日》³²⁾ 中，朱點人也敘說了浪費金錢、追趕流行的一對夫妻的荒唐行為，以及運用各種手段和方法來致富的白丁李大粒的拜金行為。此種人物類型，在楊守愚的《赤土和鮮血》中，是爲了滿足自己生活，虐待入贅女婿的丈母娘；在林越峰的《紅蘿蔔》中，則是背叛同志的漢奸，而在張慶堂的《他是流眼淚了》³³⁾ 中，欺騙貧窮朋友的人等等，不一而足。

29) 豪塞爾著，金辰旭譯，《藝術與疏離》(鐘路書籍，漢城，1983)，頁137。

30) Louis Dupre著，洪潤基譯，《馬克思主義的哲學基礎》(大田，漢城，1982)，頁150。

31) 佛羅姆針對人的個性所做的分類當中，將屬於非生產指向的類型之一命名為“市場指向性人物”，他認為這個類型的人物，是爲了討取他人的好感，而時時將微笑掛在嘴邊，並不忘把自己打扮得相當得體；但事實上他們的真正目的，著眼於交換價值的增加上面。他們把自己和他人當做商品來加以判斷，而其評價基準即在於能否得到他者肯定的成功與否上。參見鄭文吉，前揭書，頁147-150。

32) 原載於《台灣新文學》一卷六號(1936.7)；《台灣文藝》二卷七號(1935.7)。

33) 原載於《台灣新文學》創刊號(1935.12)；《台灣文藝》二卷八、九合刊號(1935.10)；《台灣新文學》二卷一期(1936.12)。

(三) 知識分子的無奈與否定現代

殖民地狀況與資本主義矛盾，在造成都市貧民和農民的貧窮及疏離的同時，也使得知識分子逐漸迷失了自我，而落入自我疏遠和無奈的情緒之中。尤其是1929年前後爆發的世界性經濟危機，造成日本國民經濟體系岌岌可危，國內市場購買力急速衰退，同時資本主義也陷入長期的不景氣狀態。為了解決此一危機，日本實施了所謂“產業合理化”的自救運動，並把自救重點放在國民經濟各部門的組織再生、技術的改進、獨占的強化、勞動強度的擴大，以及勞動力的使用減省等方面。不過這個產業合理化的過程，卻加速了生產和資本的再集中，反而有利於資本家的利益進行；其結果是殖民地台灣的勞工，在惡劣的勞動條件之下，受到日本帝國主義更嚴重的剝削。而從事社會運動的人士，同樣在持續低迷的不景氣當中，逐漸喪失了鬥志。以身處三〇年代經濟恐慌的漩渦中，失去生活意志而彷徨的知識分子為題材，呈現當代現實處境的代表性作家，當首推王詩琅。

《沒落》³⁴⁾描繪的就是曾經參與抗日運動，積極反對民族差別的有產青年，在經歷不景氣、家產縮水之後，消極麻醉自己以苟延殘喘的故事。耀源在師範學校念書時，對台灣人的差別待遇、日本當局的偽善和欺騙感到不滿，率先拒絕上課而遭到退學；之後到上海大學就讀，感到“漠然的民族意識漸把握到馬克思主義”，乃參與抗日社會運動。那時候，在台灣也正在燃燒著社會主義運動，無產青年一派掌握文化協會，他也趁這大好機會回台參與運動。但是受到在上海成立的台灣共產黨別動隊的“台灣社會科學研究會”事件牽累，不幸被逮捕關了兩年。出獄後的他，再也不能提振精神，“日夜流連酒賭之間”，過著“不勞而食的頹廢”生活。

他的憂鬱和挫折，來自無法堅持理想的懦弱，以及同時“充滿重壓的空氣的這時代，陰沉灰黯的四圍所交流錯雜驅使的。”他對殖民政府加重打壓社會運動，因而導致運動潰敗，有著嚴重的無力感。不過這個無力感，另外還來自本身的階級性格。耀源一家的家勢由於不景氣而急速地沒落，這與獻身於社會運動的自身熱情，成了反比。日本領台當時，他的父親在混亂裡發了一筆大財，就自營起雜貨小買賣，生意漸

34) 本篇作品著於1935年6月30日。

漸興隆起來，之後就改爲大買賣了。但是“歐戰告歇，占漁人之利的日本資本主義海嘯般的反動景氣襲擊來了，像深秋的落葉，物價一齊紛紛跌落。”，“兼之幾年來殺人般的不景氣”，因此到了只有典當不動產才能維持生計的地步。耀源家勢的盛衰，與日本資本主義的發展，步調相同。沒有堅固基礎的台灣資本主義，不景氣一出現，馬上就顯露衆多的矛盾。耀源的憂鬱和頹廢，象徵失去現實批判能力的殖民地知識人的精神痛苦。王詩琅透過一個積極的知識青年的無奈，重新檢視奪走他熱情的社會條件。耀源就是在資本主義矛盾和帝國主義強權的巨大勢力面前倒下去的，反映當時社會運動家的普遍模樣，同時也是作者自身的寫照。³⁵⁾ 王詩琅直接引用文化協會的左傾、台灣共產黨的成立等台灣社會運動史中的實際事件，³⁶⁾ 並運用對比的方式呈現人物所堅持的理想和失業的打擊、家勢的沒落、生活的貧困等他們所面臨的生活問題的消長關係，有效又逼真地反映他們所處的客觀現實，重新建構當代知識分子的真實面貌。透過王詩琅的小說，我們發現無論無產階級或資產階級，在不景氣這個資本主義結構性矛盾和日本殖民統治下，知識分子所感到的無奈，並吐露出對殖民資本主義現代性的批判。

除了知識分子的無奈和憂鬱外，這時期的作品也出現對現代化的全面性否定，以及透過個人慾望來克服現代社會和現代物質價值觀的傾向。翁制從《音樂鐘》³⁷⁾ 開始，即已塑造了能審視自己慾望，以及從中確認自我存在的青年；而在《天亮前的戀愛故事》³⁸⁾ 裡，更進展到由肉體和精神合一的戀愛經驗，來確認個人存在的價值，同時找出對抗現代的方向。《天亮前的戀愛故事》以告白體敘述一個正處於成長期的青年強烈希望自己能得到真正愛情的心聲。不同於一般人重視名譽、成功、富貴等世俗的價值觀，“我”幾乎成了偏執狂般的戀愛至上主義者。而在渴望戀愛的過程當中，摸索自我實現的可能性，就像每一個人用不同方式來爭取自我實現一般，對“我”來說，戀愛就是通往自我完成的一條徑道。“我”的想法裡，戀愛是一個瑣碎的、無聊的事

35) 有關王詩琅的生平，參考張恒豪，〈燃燒的靈魂〉，收入《王詩琅—朱點人合集》，頁13-15。

36) 與實際社會運動連結，來分析王詩琅小說人物的有陳芳明，〈王詩琅小說與左翼政治運動〉(《左翼台灣》，頁99-140)，以及施淑，〈書齋、城市與鄉村—日據時代的左翼文學運動及小說中的左翼知識分子〉(《兩岸文學論集》，頁49-83)等。

37) 原載於《臺灣文藝》二卷六號(1935.6)。

38) 原載於《臺灣新文學》二卷二號(1937.1)。

象，不過相信“人類思想感情的發生和進展，似乎統統開端於無聊的、帶幼稚氣味、瑣碎的事象。”並且認為“重要到幾乎可以支配這個人類的一生的瑣碎事象，卻因各個人而非千差萬別不可。”因此別人稱爲邪道的戀愛，對他來講是一個“抽出足以稱爲我的血肉的一套價值千鈞的思想”的東西。重視個人的感覺和內心經驗的同時，主角想要擺脫現代生活方式及一切現代文化，渴望回復現代前的自然狀態，他質疑所有現代科技的產物所帶給人們的真實意義。

他曾恨所有使每個人做出同樣思考和行爲的制式化物品，否定一切文明進步所帶給人類的影響。到處充滿的廣播聲音讓他發瘋；市區的電車、汽車也讓他毛骨悚然；電車的慢慢爬行，宛如鼻涕蟲；街道上猛跑的汽車就像鼠疫；另外墜機消息不斷的飛機，即使能橫越飛行太平洋、大西洋，他也不覺得那是什麼壯舉。

他之所以拒絕、否定現代生活方式，以及一切文明進步，是因為這些限制人們思考和行爲的物品，同樣也妨礙了他獲取戀愛經驗。兩次失敗的戀愛體驗，讓他認爲自己是“完全不適於生存的人”。他斷定自己是個“荒唐、愚笨、不成材的人，廢料、狂爆、意志與行爲極端分裂的人”。戀愛是唯一能夠讓他體驗自我存在價值的途徑，而“遵循那令人戰慄的既然率，那應當唾棄的慣性率，連最小限度的可能性都沒有”的現代社會，卻妨礙了他擁有這個機會。因此，他的自我否定，代表著對現代社會一切的無奈和憤怒。不管現代社會多麼便利進步，如果它限制或妨礙個人自由或慾望的實現，那麼，它並不值得肯定。可見作者的意圖在於批判及否定由理性所主導的現代性發展爲劃一性的思考。³⁹⁾

(四) 傳統家庭制度和價值的沒落

資本主義帶來的金錢至上觀念，不僅在都市造成人性和價值觀的扭曲，它滲透進農村社會，也必然帶來舊家庭制度的沒落和傳統價值觀的崩盤。呂赫若正是這方面的

39) 施淑認為翁鬧小說的頹廢受到日本私小說的影響。參考施淑，〈感覺世界—三〇年代臺灣另類小說〉，收入《兩岸文學論集》，頁100。

代表性作家。他的《逃跑的男人》、《財子壽》和《風水》⁴⁰⁾ 等小說，都同時探討了傳統舊家庭秩序面對金錢之時，如何沒落與凋零的問題。《逃跑的男人》中的男主角因為受到理應與自己站在同一陣線的妻子的背叛，憤而帶著小孩遠走他鄉。他原本是個有地位有權勢的地主的兒子，不過自從十七歲時母親過世之後，他即過得非常痛苦。他的痛苦，精神上來自與威權父親的疏離和繼母的虐待，甚至還受到繼母所帶來的弟弟的欺負；在物質方面，則因家道中落導致他學業中斷；後來好不容易娶了老婆，原以為從此有個志同道合的伴侶了，但是妻子却背叛在家沒地位也不受父親信任的丈夫，趁丈夫遠行時與繼母的兒子私通，徹底粉碎了他唯一的希望。

《財子壽》中的福壽堂主人周海文，不僅吝嗇到幾乎六親不認，同時也性好漁色。早些年前與他私通的太太下女秋香，東窗事發後，不能見容於太太，因而被逐出家門。但當海文娶了繼室玉梅之後，秋香又帶著小孩回來；海文這時流露出欣喜之色，給予她作威作福的勇氣；於是秋香就籠絡下女素珠，開始虐待玉梅。不僅如此，素珠進一步成功的引誘了海文，便與秋香互相爭奪海文所交代的鑰匙；然而兩個女人都被海文擺了一道，她們所搶到的只不過是枝抽屜鑰匙，而非開啓金庫的鑰匙。最後素珠也重蹈秋香的覆轍，等著媒人上門；秋香則偷了錢遠走高飛；至於賢淑的玉梅則因受到秋香的潑辣專橫，以及自己一向信任的素珠的怠慢，在不堪虐待之下終於生病發瘋。小說生動的呈現以男性為中心思考及金錢至上的價值觀念，如何導致傳統舊家庭遭受危機終至崩潰的詳細過程。像這樣，這些小說所要呈現的舊家庭，大多是描繪父權至上、男尊女卑及好色男性下的女性問題等封建舊秩序，在資本主義影響之下，走上沒落之路的情景。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他們之間的男女關係，並不是建立在正常人格發展的關係上面，而是以金錢做為交換媒介的條件。《逃跑的男人》中背叛處於困境中的丈夫的罔留，以及《財子壽》中纏住地主海文的秋香，就是這樣的例子；她們都是已婚婦女，但面對金錢的誘惑，很容易就逾越傳統婚姻中正常夫妻關係的規範，而做出不正常的行為。

金錢的强大力量，不只在男女關係中發揮威力，更進而嚴重考驗著傳統中國人侍親盡孝、兄友弟恭、慎終追遠等孝道禮教的觀念。《風水》描繪的是環繞在父母墳地

40) 原載於《台灣新文學》二卷四號(1937)；《台灣文學》二卷二號(1942)、二卷四號(1942)。

的風水迷信，所展開兄弟間反目成仇的衝突情形。弟弟周長坤因私慾薰心，聽信風水之說，爲了自己家人未來的榮華富貴，不顧哥哥周長乾的勸阻，執意不讓安葬已有十五年的父墳洗骨。不僅如此，當家裡遭逢變故，他又想將下葬不到五年的母墳遷葬；儘管還不是撿骨的適當時機，他也聽不進兄長的諫言，硬是將尚未腐化的母親遺體，刮掉屍肉，強行洗骨。可見盲目追求個人榮達和滿足私利慾望的價值觀念，在農村社會已取代了封建秩序和價值規範的位置。呂赫若藉著這些小說，表達了他對農村現代化所持的否定看法，他認爲台灣農村的現代化，由於尚存的封建性和金錢的結合，正朝著不正常的方向發展。

如果說納妾和迷信是應拋棄的封建思想及行爲，那麼，孝道和慈愛、兄弟之間的友誼和人與人之間的相互關懷，就是能克服金錢崇拜的現代物質邏輯的最後堡壘。《逃跑的男人》中的“我”渴望父親的關懷和妻子的愛情；《財子壽》中的玉梅雖然因先生的好色和吝嗇，以及秋香的虐待，而導致精神崩潰，也不忘諒解別人的做人基本態度；《風水》中的周長乾老人，雖然飽受弟弟的欺侮，但仍然努力挽回兄弟間的情誼。不過，在小說裡這些堅持傳統道德倫理的人物都面臨失敗，他們的願望也終究無法達成。可見作者想要指控的是，在台灣現代化的浪潮中，金錢第一的偏差觀念已填滿了封建秩序崩盤的縫隙，強烈批判資本主義現代性的同時，出現指向於傳統價值的傾向。

四、皇民化的內在矛盾與回歸傳統

1937年日本引發中日戰爭，全面展開對中國大陸的軍事侵略行動，在台灣推動皇民化運動。所謂皇民化，就是要把台灣人改造成日本人，更精準地說，改造成在戰場上能夠爲日本犧牲性命的人。日本爲了有效達到這個目標，提出了“日台融合”和“大東亞共榮圈”的說法。所謂的“日台融合”或“日台一體”，就是推行皇民化運動的內在邏輯兼支配理念：其核心內容爲台灣人只要把日本天皇當成活著的神來崇拜，並努力完

成萬世輔翼臣節，就能成為皇民，受到一視同仁的皇恩。而“大東亞共榮圈”的構想，來自中國古代社會思想，也就是小範圍為家，大範圍為國的觀念。日本視自己為一個皇帝，其他國家為臣民，在天皇與臣民之間的關係上，應用君臣之間“義”、父子之間的“情”，來說服殖民地國家的協助和推崇。⁴¹⁾

如此，把台灣人塑造成天皇的臣民，並以天皇為中心，讓台灣人積極參與建設東洋帝國，對抗西方帝國主義，這就是皇民化運動的理論根據。他們把這個絕對性國粹主義、極右思想，以大亞主義、大東亞共榮圈等反西方東洋團結的邏輯來加以包裝，並強加於殖民地台灣人民的身上，同時也把它當做至高無上的原則，用以剝奪台灣人民의思想和言論自由，進而在物質、精神兩方面，把台灣人動員到非理性的戰爭當中。可見皇民化運動的內在理念，其本質屬於天皇制法西斯主義。日本在“天皇歸一”的思想基礎，加上“八紘一宇”的邏輯，試圖建立起以天皇為中心的祭政一致國家形態。如此，在具有封建性質的天皇制基礎上，融入資本主義的產物—帝國主義，再合成創造出的“大東亞共榮圈”構想，其實就是日本式扭曲的現代性，其邏輯本身證明具有扭曲以啓蒙和理性精神為核心的現代性性質。

而且，日本把封建性加上帝國主義性質混成的“大東亞共榮圈”構想，硬是宣傳為能克服西方帝國主義的侵略，帶來東洋國家真正解放，以及建設東洋現代國家的利器，其本身所含的邏輯破綻不說，更讓台灣人民和知識分子陷入以日本式扭曲的現代性來對抗西方資本主義現代性的矛盾泥淖之中，帶給他們思考和價值上的混亂局面。

這個時期，在強大的皇民化壓力下，台灣文學的理論建構與討論受到空前的壓迫。不僅中文創作被禁止、文藝雜誌遭廢刊，當時的文人也被動員到皇民文學的旋渦之中。皇民文學的主要內容，除了強調日本民族的優越外，並要設法把日本挑起戰爭的行為合理化。而且隨著戰事的推移，文學陸續扮演起強調皇國精神、確保與日本之間一體性、協力戰時經濟體制、勤勞生業保國、後勤支援，甚至鼓吹台灣青年走上戰場等的角色。

面臨如此艱難困境，台灣作家除了少數屈服於國策文學之外，大多採取曖昧模

41) 有關日本國體精神和大東亞共榮圈的內在理念，參考整理自〈極秘：內鮮一體理念及其具現方策要綱〉，《大野文書》1260，朝鮮總督府。（轉引自崔由利，〈日帝末期(1938年-45年)“內鮮一體論與戰時動員體制”〉，韓國梨花女子大學歷史系博士學位論文，頁15。

糊、模稜兩可的立場，巧妙地迴避了皇民主題。其中，呂赫若的小說《清秋》⁴²⁾在探討從軍這個皇民主題的同時，也揭露了現代知識分子對傳統意義的思索問題。從東京醫專畢業的耀勳，在父母的期盼下，離開繁華的現代化都會東京，返回自己美麗的故鄉，準備開業。可是回到台灣之後，耀勳卻下不定決心，深感苦悶。讓他煩惱的原因可以歸納出下列幾點：一是他怕跟不上時代，此與時下青年普遍都不想安居落後鄉下的時代氛圍有關，而且也與弟弟耀東決定去南方發展大有關係，然而這種想法又與父母期待的孝道產生衝突，使得他躊躇不安。二是擔心自己與其他鎮上的醫生一樣，也變成一個只認得金錢的庸醫，而那些醫生正妨礙著他開業，江有梅就是其中主要的人物。三是怕自己的開業連累到別人的生計，因為他父親決定要蓋醫院的地方，原本租給別人作為飲食店，現在如果收回，會為開飲食店討生活的黃明金母子帶來困擾。這種原因都使得他猶豫不決，感到矛盾。不過，在開業方面，耀勳所碰到的問題，都因為這些關係人決定去南方發展而得到解決，這些人的南方行，正與日本引發的太平洋戰爭有著密切關聯。小說在結尾地方安排耀勳受到鼓舞決定開業，呈現出符合國策文學的面貌，因為這些人決定去南方，才使得耀勳確定了自己該走的路。

不過，更仔細的分析小說，當會發現這些人的南方行，並不是那麼出自個人意願，也不是受到耀勳所理解的偉大理想所驅使，而是為了解決個人面臨的困境，所選擇的一個手段而已。弟弟耀東之所以決定去南方，即是因為在工作的東京製藥會社裡，得不到應有尊重的關係，與什麼偉大使命感根本扯不上關係。黃明金的從軍也是為了解決現實問題所選擇的一種個人出路，他正面臨店面的歸還，以及因為戰爭而生意大不如前的困擾，因而欣然接受徵召。江有梅的情況也跟黃明金大同小異，他不想當鎮上的庸醫，也想突破自己對醫學不足的信心，這時剛好被徵召，因而決定前去南方。在這裡，我們可以發現作者巧妙地暗中否定了當時日本在台灣極力推動的從軍、南方行等皇民化方案。⁴³⁾

其中，回歸傳統的問題，就與最後耀勳決定開業並安居故鄉的動機有關，成為這

42) 1944年3月小說集《清秋》由台北清水書店出版，收錄於《呂赫若小說全集》，頁414-469。

43) 對此，許多學者持有不同看法，例如呂正惠認為《清秋》則響應南進政策、與時局有關的作品，參考〈呂赫若與戰爭末期台灣的歷史現實－《清秋》析論〉，“北京呂赫若作品學術研討會”(1998.1.14-19)。

篇小說的重點所在。小說圍繞著耀勳的開業問題展開，從回到故鄉，並經歷一連串的事情之後，最後他決定開業時結束，而其過程也與耀勳以先進和落後的二分法看待東京和故鄉的視角，逐漸改變為對故鄉和傳統感到溫暖的過程一致。例如，內容中一再出現對漢學修養深厚的祖父表示敬畏之心、對父母盡孝道的決心、對家人團聚的溫馨等，都是主角回歸傳統價值觀和生活方式的一種肯定。

目睹祖父在家的絕對權威，以及父親所表現的孝行，眼裡充滿感激之情。吃完晚飯，大家閒談耀東的事一會兒後，回到自己的房間，感激之情依然沒有消失，胸口一股暖流流過。它也應該說是家庭生活的基本吧。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無以言喻的幸福感不斷湧上心頭。⁴⁴⁾

如此，能安定青年耀勳驛動之心的，並不是相關人士的南方之行，而是在於身邊有充滿愛情、信賴、尊敬、學問、藝術的家人存在，以及作為兒子應盡孝道的家傳精神之影響所致。⁴⁵⁾ 特別是在小說裡巧妙地安排耀勳對農村生活、藝術、大自然產生嚮往的情節，足夠說明他決定在故鄉開業的正當性。用這個角度來分析《清秋》，我們即可知道呂赫若真正想要表達的，是一個擁有現代都市生活經驗，並具有現代價值觀的青年，在經過返回故鄉的種種過程當中，結束了以南方為代表的時代潮流，終於回歸自然與保有傳統價值觀的家人懷抱。⁴⁶⁾ 可以說是日據末台灣作家，面臨強迫接受皇民化，也就是日本式扭曲的現代性時，從民族傳統當中找出能對抗皇民化出路的苦心。

44) 《呂赫若小說全集》，頁434-5。

45) 對此，葉石濤另有不同看法。他把耀勳的苦悶，解釋成係受到巨大的封建控制力量所致。參考〈清秋—偽裝的皇民化謠歌〉，收入《小說筆記》，頁84-90。

46) 就像黎湘萍所分析的，這篇小說是從都市與鄉村、現代文明與傳統文化這種兩極對立的敘述架構裡展開其情節，實際上非常隱晦地包涵了對於日本“文明”的拒斥。參考〈戰後台灣文學的文化想像〉，“戰後五十年台灣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1999.11.12-14)。

五、結語

以上，本文是以日據時期台灣小說為對象，依序從新文化運動時期、殖民資本主義的進展時期，以及日本推動皇民化時期，配合各時期的台灣社會狀況，考察了台灣現代小說反映現代性問題及接受樣態。如論文中所討論，由於台灣的現代化過程，係與日本殖民主義的進展同步進行，因此，日據時期台灣小說所呈現的現代性接受過程及其樣態，也就呈現出既複雜又帶有多重的面貌和軌跡。

台灣在開始接觸西方現代，並對民衆進行啓蒙的第一個階段，知識分子普遍渴望接受科學、民主和理性精神的西方現代價值，展現的是肯定及追求現代性的立場。不過，由於處在殖民地環境，不得不以日本作為媒介來接受現代精神，這也造成台灣的現代性，朝著顧及日本利益的方向，片面的、畸形的發展。在此環境下，台灣作家在小說中以法律的不公平為主要題材，質疑日本主導的現代價值的意義所在，呈現出對現代的渴望和否定態度的雙重視線。

在第二個階段，由於日本以自己的利益為優先考量，推動台灣現代化，因此其過程總是帶有殖民資本主義的剝削性質，台灣社會內部的貧富差距和民族、階級矛盾也就日益擴大，個人能力決定自身財富的資本主義魅力不再被認同，人和人、人和工作之間的異化情形嚴重，加上資本主義金錢至上價值觀，普遍蔓延到社會各個階層，資本主義現代性的負面影響浮上檯面，許多小說開始對資本主義現代性提出懷疑，甚至全面否定或不適應現代的聲音也湧現開來。

而在最後階段，日本巧妙地利用封建性和帝國主義性質來推動皇民化這個假現代精神。台灣知識分子面對如此被扭曲的現代性，選擇了回歸傳統文化和民族精神價值，以突破變相的現代化，同時也巧妙地迴避了皇民化的壓力。

綜上所述，我們不難看出，日據時期台灣小說所呈現的，對現代性的接受及反思、批判和否定、迴避和突破的文學軌跡，不僅是在台灣文學，其他經歷過殖民經驗的國家也同樣走過，而且即令到了高喊全球化的今天，也仍然是必須面對的文學課

題。個人希望在本文中針對日據時期台灣小說的殖民地現代性面貌所進行的探討，能夠提供我們在了解東亞現代文學上一個角度，同時也希望能成為戰後台灣文學研究的一個基礎。

< 參考文獻 >

《台灣民報》九十二、九十三號(1926.2.4、2.21)。

《台灣新民報》三九六號、三九七號(1932.1.1、9)。

《南音》一卷二號、六號、九、十合刊號(1932.1、4、7)。

《一桿秤仔》，《台灣作家全集—賴和集》(前衛，台北，1991)。

《奪錦標》，《台灣作家全集—楊雲萍、張我軍、蔡秋桐合集》。

施淑，〈稱子與稱錘—論賴和小說的思想性〉，收錄於《兩岸文學論集》(新地，台北，1997)。

____，〈書齋、城市與鄉村—日據時代的左翼文學運動及小說中的左翼知識分子〉(《兩岸文學論集》)。

____，〈感覺世界—三〇年代臺灣另類小說〉，《兩岸文學論集》。

林瑞明，台灣文學與時代精神(允晨，台北，1993)。

《蛇先生》，《台灣作家全集—賴和集》。

王詩琅，《沒落》，《台灣作家全集—王詩琅、朱點人合集》。

____，《十字路》，《台灣作家全集—王詩琅、朱點人合集》。

警察沿革誌編纂委員會，《台灣社會運動史IV—農民運動》(創造，台北，1989)。

鄭文吉，《疎離論研究》(文學與知性社，漢城，1991)。

朱點人，《秋信》，《台灣作家全集—王詩琅、朱點人合集》。

豪塞爾著，金辰旭譯，《藝術與疏離》(鐘路書籍，漢城，1983)。

Louis Dupre 著，洪潤基譯，《馬克思主義的哲學基礎》(大田，漢城，1982)。

崔由利，《日帝末期(1938年-45年)“內鮮一體論與戰時動員體制”》，韓國梨花女子大學歷史系博士學位論文。

<국문제요>

본 논문은 일제시기 대만소설을 대상으로 하여 일본이 주도한 자본주의의 진전이 대만의 농촌과 도시, 지식인과 민중에게 어떻게 반영되어 나타나는지를 살펴보는 데 목적을 두었다. 1895년 일본의 식민지로 전락한 대만은 한국에서와 마찬가지로 중주국 일본의 이익을 우선으로 하는 식민 자본주의의 진전이란 형태로 현대적 사회로 접어들게 된다. 따라서 초기 지식인들이 염원하던 과학과 신문명, 인간존중과 평등 등 서구의 현대적 가치에 대한 열망과 적극적 도입의지에도 불구하고 얼마가지 않아 자본주의 생산방식의 확대에 따른 현대성 수용문제에 대한 성찰이 필연적으로 제기되었고 이는 전체 식민시기를 걸쳐 일본의 정책변화와 관련하여 여러 가지 양상으로 표출되었다.

본 논문에서는 신문화운동시기, 식민자본주의 진전시기, 그리고 황민화운동시기 등 세 단계로 나누어 각 시기 소설에 나타난 현대성 수용면모를 고찰하였다. 그 결과, 신문화운동 시기인 1920년대 초, 중반기에는 계몽과 진보를 원리로 하는 서방 현대사상이 적극적으로 수용되었으나 賴和로 대표되는 이 시기의 소설에서 보듯이 현대제도와 법률이 일본인의 이익을 위해 임의적으로 적용되는 데에 대한 비판과 이를 통한 현대성 수용의 문제를 심각하게 고민한 것을 볼 수 있었다.

두 번째 시기인 1920년대 후반부터 1930년대 전 시기는 식민자본주의가 고착되는 시기로 빈부차이의 격화, 농민의 영세화 등과 자본주의 폐해인 인간소외와 몰화 등 부정적 현상이 만연하게 되고 이런 양상은 蔡秋桐, 朱點人, 楊守愚, 呂赫若, 王詩琅 등 여러 작가들에 의해 부정적으로 자본주의 현대성을 인식하는 형태로 반영되었다.

세 번째 시기인 1937년부터 1945년까지는 왜곡된 현대성 논리인 '대동아공영', '동아 신체제' 등 담론과 억압적인 황민화정책의 실시로 인해 현대적 가치에 대한 믿음은 자취를 감추고, 중국적 전통과 민간풍속으로 회귀하는 모습으로 현대성에 대한 전면적 부정을 드러내었다.

이러한 일제시기 대만소설에 드러난 현대성에 대한 적극적 수용, 반성, 비판과 전면적 부정의 궤적은 동일한 식민지 경험을 가진 한국문학의 이해에도 참고자료가 될 수 있으리라 생각한다.

중심어 : 일제시기 대만소설, 현대성, 신문화운동, 식민자본주의, 황민화운동